

# 變革年代學術期刊的數字化生存

朱 劍

---

**[提 要]** 中國學術期刊正面臨著兩場交錯在一起而又全然不同的變革：出版形式的變革（數字化）與出版體制的變革（轉企改制）。如果體制改革僅停留在目前紙本期刊的範圍內，並不能為學術期刊贏得未來，因為數字化生存將是未來學術期刊基本的生存狀態。只有將這兩場都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革無縫地對接在一起，將決策者的頂層設計與業界的底層設計完美地結合起來，體制改革和數字化轉型才有望獲得成功，集約化、規模化發展才可能實現。

**[關鍵詞]** 學術期刊 報刊體制改革 數字化

**[中圖分類號]** C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3) 02 - 0104 - 12

---

在剛剛出版的2013年第1期《澳門理工學報》“總編視角”專欄的主持人語中，劉澤生總編就已有244年歷史的《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停印紙版，完全轉入數字化線上出版一事慨然嘆道：“紙版《百科全書》的絕唱，既是一種無奈，也是一種必然——不管它是被迫退出，還是主動轉型，或是兼而有之，為重生而終結。數字出版乃大勢所趨。互聯網改變了世界。一個新的出版時代到來了。”<sup>①</sup>是的，數字化已成為一股無法抗拒的潮流，紙版的絕唱可能會在全球不同的地方不斷地響起。在期刊界，學術期刊很可能成為第一個告別紙版，完全實現數字化傳播的期刊類別，而在中國，這個絕唱的序曲早在十多年前就已拉開了帷幕。

然而，對於中國期刊人來說，他們所要面臨的變革還不僅僅是數字化轉型，同時到來的還有延續了六十年的期刊體制也將發生根本性的改變。2011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於深化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體制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改革意見》）<sup>②</sup>，改革的基本精神就是市場化。2012年7月，新聞出版總署發布了《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sup>③</sup>，市場化被明確規定為學術期刊改革的唯一目標和路徑。

因此，學術期刊正面臨著兩場交錯在一起而又全然不同的變革：出版形式的變革與出版體制的變革。無論哪一場變革，都堪稱是革命性的，都足以徹底改變業界的面貌。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人來說，兩場變革皆非內生——數字化源起於人文學者相當隔膜的電腦及網絡技術，體制改革則是國家權力部門自上而下推行的。因此，當變革真正到來之時，特別是當《實施辦法》

破滅了體制改革會對學術期刊網開一面的幻想之後，管理部門與業界的分歧便清晰地表露出來。許多期刊人採取了消極而又不失激烈的抵抗態度，即使一些主張應該改革的期刊人，對於一刀切地“轉企”也表達了深深的懷疑和憂慮。無論是抵制、反對，還是懷疑、憂慮，其最初的衝動都是緣於對自身利益的考量。無庸諱言，變革必然帶來原有利益格局的根本性改變，而作為改革對象的期刊人，在這兩場皆非內生的變革中，都處於相對弱勢地位，首先考慮如何維護自身的利益，乃人之常情。但從長遠看，期刊人的利益是與期刊的前途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的，如果改革確實能帶來學術期刊的大發展，那麼，改革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期刊人只要應對正確，就應該能通過改革獲得更大的利益。因此，期刊人不能為眼前的利益所困惑，而應該冷靜地分析改革可能給期刊帶來的利弊得失，從而作出明智的選擇。

其實，近年來學術期刊人已充分感受到了變革來臨前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壓力，一直在苦苦尋找應對體制改革和數字化潮流的合理路徑。當筆者回顧近年來業界相關研究時，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就是很少有人將體制改革與數字化變革聯繫起來分析，更很少有人將這兩者結合起來設計改革方案，而在筆者看來，這兩場歷史性變革的不期而遇已註定了它們的進程必然會交織在一起，單獨地針對其中的一個，很難找到真正的應對之道。本文意在站在學術期刊的立場，從學術期刊發展的角度，分析同時發生在中國的這兩場變革的特點及相互之間的關係和影響，以探討變革年代學術期刊的數字化生存方式。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 一、變革年代之學術期刊體制改革

作為報刊體制改革組成部分的學術期刊體制改革是由中央發動並部署、由新聞出版總署具體施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之所以要進行改革，中央“兩辦”《改革意見》說得很清楚：“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的現行體制制約了報刊出版業發展，存在數量過多、規模過小、資源分散、結構不合理、市場競爭力弱等突出問題……這種狀況既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入發展的需要，也不符合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要求，迫切需要深化改革。”在決策者眼中，上述判斷對學術期刊也是適用的，因為上述問題也普遍存在於學術期刊中。但是，通過“轉企”，真的能使一切問題迎刃而解嗎？要回答這一問題，需要證明“轉企”是一劑針對學術期刊諸多問題的良藥。

第一個問題是“數量過多”。這包括期刊的數量和期刊出版單位的數量。具體到學術期刊，數量到底是多了還是少了的問題一直存在爭議。單從總數來看，學術期刊的量的確不可謂少，在全國近萬種期刊中，學術期刊佔據了多半壁江山，但如果平均到每個學科及各學科學術人口，就會看到極不平衡的現象，很多分支學科擁有的學術期刊少得可憐。因此，多與少的問題需要與期刊的分佈和結構等問題綜合起來看。撇開期刊數量，期刊出版單位過多的問題則是肯定存在的。這些出版單位多為高校和科研院所下設的編輯部，皆屬事業單位編制、不能獨立承擔社會法律責任的非市場主體，按照《實施辦法》，編輯部將併入本單位或地方出版企業，或三個以上編輯部成立企業性質的期刊社，再加上轉為內部刊物或直接退出的，期刊出版單位的數量將會有大幅度的減少，“轉企”在這方面的積極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個問題是“規模過小”。這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某一期刊的紙本發行量及數字版的點擊量和下載量；二是某一出版單位擁有的學術期刊數量。學術期刊的質量決定了它必然是小眾刊物，用發行量來衡量某一學術刊物的規模是沒有意義的。因此，學術期刊的規模只有看其出版單位擁有學術期刊的數量。在現行體制下，一個出版單位（編輯部）只有一兩種刊物是普遍現象，

基本無規模可談，也難有效率可言，走市場化道路更不可能。按照《實施辦法》“轉企”後，這種情況將大為改觀，即使期刊總量不變，出版單位也會減少一半以上，這顯然是一種進步。

第三個問題是“資源分散”。這是與“規模過小”相關聯的問題，規模小了，資源必然分散。所謂資源，對於學術期刊來說，本應是創辦者擁有的科研能力、學術影響力以及人力財力物力。但在現行體制下，與刊號相比，這些都變得不重要了，刊號才是最寶貴和稀缺資源。作為學術期刊重要一類的高校學報就是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只要是個高校，不管其科研實力如何，都可以辦一家綜合性學報；另一方面，具有強大科研實力的高校，卻也只能辦一家綜合性學報。這種刊號資源分配中的絕對平均主義使得學術資源面臨著雙重的浪費：實力強大的高校辦刊能力的浪費和實力弱小的高校期刊版面的浪費。”<sup>④</sup>所以，資源分散與資源浪費是同時存在的問題。公正地說，造成這一明顯不合理現象的根源不在期刊，而在管理部門，因為刊號資源的配置權，完全掌握在新聞出版總署手中。因此，要改變資源分散的現狀，關鍵在總署，必須徹底改變資源配置的方式。當然，“轉企”可以將部分期刊予以集中，對於解決資源分散問題，也是有積極意義的。

第四個問題是“結構不合理”。具體到學術期刊，就是綜合性期刊太多，專業和專題期刊太少，這一問題在高校學報中尤為嚴重，造成了學術研究與學術期刊之間供求關係的錯位。這一問題與“資源分散”問題實際上是一體兩面，是現行期刊體制下必然產生的問題。相信“轉企”後期刊的自主權將會得到加強，至少會有部分期刊可以根據學術研究的需要改變自己的學科定位，體制改革對於解決學術期刊的結構問題的積極意義也是存在的。

第五個問題是“市場競爭力弱”。當上述諸問題彙集到一起時，必然造成學術期刊無法適應學術研究需要這一根本性問題，從市場的角度看，就是產品與市場需求相脫節，其市場競爭力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尤其在國際學術期刊大量進入中國研究者視野的情況下，中國學術期刊的市場競爭力就更弱了。“轉企”後，學術期刊人必須直面市場。當然，這個市場不同於一般消費類期刊的市場，而是符合學術研究需要的市場，學術期刊人必須為構建和遵守這樣的市場規則而努力，從長遠看，對學術期刊的發展是有意義的。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上述問題的存在與現行的期刊體制有關，改革現行期刊體制是學術期刊今後獲得良好發展所必需的，亦即改革現行期刊體制是完全必要的。<sup>⑤</sup>但是，在期刊體制的形成和運行過程中，學術期刊只是被動的一方，政府才是主導，改革顯然不能僅單方面地針對學術期刊，許多看似期刊的問題，根源卻在政府，比如以上分析的學術期刊數量多或少的問題，資源分散、結構不合理以及未能形成規模的問題，都是與現行的期刊審批和管理制度有關的。如果改革僅局限於期刊“轉企”，而政府的管理體制一成不變，雖然也能產生一定的效果，但效果是間接的，實現的過程是緩慢的，改革也是不徹底的，“轉企”只是個治標不治本的辦法。

其實，上述問題只是學術期刊問題的表像，透過表像，我們還可以看到更深層次的問題。

問題之一：科學體系的缺失。與走市場的大眾期刊不同，學術期刊的體系不能靠一般的市場選擇來建構。學術期刊的體系應該由其傳播學術的使命所決定，一個國家的學術期刊體系原本應該與該國學術研究的學科體系完全吻合，而學術國際化潮流則促使一些科學強國的學術期刊體系構建體現出了強烈的國際化色彩，成為面向全世界學者開放的公共平臺體系。而在我國現有學術期刊體系構建過程中，學科色彩被大大地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單位色彩，體系所依憑的不是學科，而是單位的行政區劃。在這樣的學術期刊體系下，定位不清、邊界不明、大量同構的數千種學術期刊，看似體量龐大，實則效率極低，數量多只是假像。今天學術期刊種種問題歸結到一點，

就是沒能很好地完成其使命，未能真正成為學科或問題邊界清晰、開放的、平等的學術交流平臺，更未能成為某一學術共同體的中心。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用的即真正能滿足學科發展的學術期刊的缺失，進而造成了學術期刊科學體系的缺失，這才是問題的本質。重建科學的學術期刊體系，當是學術期刊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我們不可能將重建科學的學術期刊體系的希望寄託在單純“轉企”後的市場化，學術研究的需要不簡單地等同於以利潤為目的的發行市場的需要，許多高深專業期刊，讀者只是很少的人，完全靠發行市場來調節，這部分期刊根本無法生存，但這些專業研究事關國家的軟、硬實力，任何一個負責任的國家都不會允許這些期刊被市場所淘汰。

問題之二：門戶壁壘的阻隔。在以單位為中心形成的學術期刊體系下，幾乎每一本學術期刊都會打上深深的單位烙印，這種強烈的單位色彩的直接後果就是使學術期刊深陷門戶壁壘的困境——期刊成了主辦單位的“自留地”，學術公信力和學術交流功能的弱化乃至喪失是必然的。不破除單位制，指望單純的“轉企”就能建設開放的具有公共平臺特徵的學術期刊是不現實的。

問題之三：專家學者的疏離。成功的學術期刊始終是與學術研究密不可分的，而且，一定是某一學術共同體的中心，有著自己獨有的作者和讀者群體，學者對學術期刊有著真誠的信任感和歸依感。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點是主編和編輯必定來自學術界，亦即首先是學者，其次才是主編或編輯。對照這些要求，今天的許多學術期刊都難以達到，特別是跨越了多學科的綜合性期刊很難培養起一般學者對它的歸屬感和認同感，難有自己的忠實作者和讀者，學者與學術期刊的疏離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如果某一期刊與學者相分離，那麼，這個期刊的生命力也就不復存在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實行編輯部“轉企”，只會加速學者與期刊的疏離。

以上這些問題大多是學術期刊所獨有的，其生成的原因更為複雜，涉及政府、學術界和期刊界多個方面，而且這些深層次的問題比表面上的問題更影響學術期刊的發展。

因此，期刊體制改革不能照搬一般文化事業單位特別是出版社體制改革的套路。改制前的出版社雖然也有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種種問題，但遠沒有學術期刊那樣複雜和嚴重，且從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在與市場打交道，已具備了豐富的市場經驗，以“轉企”為目標和手段的改革是水到渠成的事。學術期刊則不同，在上述諸多問題未得到有效解決之前，通過“轉企”將學術期刊強行推向市場，並指望就此解決所有的問題，無疑是本末倒置了。可以預見的是，這樣的改革還會帶來新的問題：第一，學術期刊將與學術研究母體相分離。這完全違背了學術期刊的傳統和規律，與國際慣例和學術界對學術期刊的期望完全背道而馳。第二，人才流失。學術期刊的編輯大多身兼研究與編輯二任，近年來，亦有許多著名學者走入了編輯隊伍，因“轉企”而導致的與科研母體相分離必定使他們選擇離開期刊而回歸科研隊伍。這批人的離去，可能使學術期刊從此一蹶不振。第三，市場失範。大型學術期刊集團並不能因“轉企”而自然形成。在一流期刊人才大量流失的情況下，社會上的大型出版集團能為無法贏利的學術期刊投入多少值得懷疑。市場化後得不到資助或資助不足的期刊只能靠收費維持，沒人又沒錢，提高學術質量只能是空想，而市場混亂卻是可以想見的。做大做強學術期刊將無基礎可言，學術期刊很可能變得更小更弱。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學術期刊體制改革必定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改革必須在政府與期刊相關的各種制度層面上全面展開。“轉企”既不是改革的目標和唯一的手段，也無法承擔所有的改革任務與責任。但是，自上而下發動的體制改革還是為革新學術期刊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機遇和一個有力的支點，現在，我們需要找到一個杠杆，讓政府與期刊可以聯手撬動盤根錯節的現行期刊體制，使學術期刊獲得新生。在筆者看來，這個槓桿非數字化莫屬。

## 二、變革年代之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

與體制改革不同，數字化對於學術期刊來說，只是出版技術和形式的改變，其意義和影響似乎無法與體制改革相提並論，但實際上可能正相反，這場變革的意義一點也不亞於體制改革。

數字化起源於電腦技術，隨著電腦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普及，一個革命性的變化已在世界範圍內實現——信息時代來臨了。在信息時代，“信息/知識成了社會的主要財富，信息/知識流成了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信息/情報源成了新的權力源。”信息技術之所以能取代工業時代大機器和流水線成為時代的主流，正是借助於數字化。數字化徹底改變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渠道、方式、速度和量級。“隨著信息技術的普及，信息的獲取將進一步實現民主化、平等化，這反映在社會政治關係和經濟競爭上也許會有新的形式和內容，而勝負則取決於誰享有信息源優勢。信息和信息技術的本質特點，在社會和經濟發展方面也必將帶來全新的格局。”<sup>⑥</sup>由此可見，數字化雖然只是代表了一種新技術，但它與歷史上催生了工業革命的蒸氣機昭示了大機器工業時代的到來一樣，技術革命再一次給予人類社會以開闢新時代的革命性動力。1996年，美國學者尼葛洛龐帝的《數字化生存》一書問世，第二年即有了中文版，<sup>⑦</sup>這本被譽為“20世紀信息技術及理念發展的聖經”風靡一時。隨著該書的傳播，數字化生存成了我們耳熟能詳的新理念。在數字化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存在和生存方式而成為新時代的標識之時，其意義委實不容小覷。

置身於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對數字化技術給整個社會帶來的變化都有或多或少的切身體會。從數字化生存的理念被普遍接受至今已過去了十多年，數字化浪潮在人們經濟、社會、文化、生活各領域高歌猛進。如果說對於數字經濟的發展一般人還缺乏直接的感受，那麼，傳播領域的變化則是人人都能感受得到的，得益於數字技術，新媒體不斷出現，傳統媒體努力轉型，信息的數量呈幾何級數增長，信息的形式更是多種多樣，傳播已與地理上的距離無關，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只要有互聯網，信息的傳播就變得既容易又迅捷。不僅人們獲取信息的途徑和習慣已徹底改變，而且也導致了整個社會生態的改變。

同樣屬於媒體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按理說應該是數字化技術的最大獲益者之一，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早在十多年前，筆者就曾撰文討論了電腦與互聯網技術對社科學術期刊發展的影響，從電腦技術對學術期刊編輯、出版到發行、傳播的影響作了全景式的掃描，並指出：“應該說，在與學術有關的各行各業中，沒有哪一個行業如出版業那般因電腦的介入而發生了如此影響深遠的變革……最終必然會導致出版觀念的變革。……如何應對這一趨勢所給社科期刊編輯帶來的種種挑戰，也己是一個擺在我們面前十分緊迫的課題。”<sup>⑧</sup>然而，儘管數字化技術和理念在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界一直呈現出持續不斷和步步推進的態勢，但相對其他媒體來說卻緩慢了許多，數字化的動力始終沒有完成從外在到內生的轉變，期刊人在數字化進程中，很少主動應對，結果自然處處被動，特別是在期刊傳播領域的被動。

傳播的變革始於上世紀90年代中期，1997年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電子雜誌社成立可以說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該雜誌社先後與數千家期刊社簽署了合約，以數字光盤的形式，將這些刊社的學術期刊予以彙集再出版，打包發行。這一合作模式意味著學術期刊將數字化傳播權拱手讓給了光盤版電子雜誌社，而將自己置身於事外。1999年，該雜誌社實現了從光盤版到網絡版的轉型，始建中國知網（CNKI），採用數字圖書館技術，建成了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規模最大的“CNKI數字圖書館”。這實際上是一個欲一網打盡所有學術期刊並向全社會全世界開放的數據

庫工程。與此同時，類似的萬方和維普數據庫也先後開建，基本形成了今天學術期刊傳播領域中佔據霸主地位的“三駕馬車”。

中國知網創建伊始，就確立了宏偉的目標：“一是大規模集成整合知識信息資源……；二是建設知識資源互聯網傳播擴散與增值服務平臺……；三是建設知識資源的深度開發利用平臺……；四是為知識資源生產出版部門創造互聯網出版發行的市場環境與商業機制……”<sup>⑧</sup>這些目標的意義不言而喻，至於是否已經實現則可另當別論。在筆者看來，以中國知網為代表的大型期刊數據庫給學術傳播帶來的最大變化是讀者（學者）閱讀學術文獻的習慣發生了徹底改變：由讀紙本的期刊變為讀數據庫。

這一變化給予以傳統紙本期刊編輯為中心工作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的影響是致命的。如果說期刊數據庫將各入編期刊送上了互聯網這一信息高速公路，那麼，在這條高速公路上跑的顯然已不是那紙本的期刊了。在中國知網等大型期刊數據庫中，期刊已不再作為傳播的基本單元而存在，最基本的單元已變為論文，以最常見的方式檢索，如題名、作者名、關鍵字，所得到的是來自同一檢索目標下的各種期刊的一篇篇論文。因此，這樣的數據庫對讀者閱讀方式的改變，已不僅僅是介質上的一一紙本的還是數字化的，而且，更是實質上的一一期刊不見了，因期刊而存在的刊物特色、編輯思想、編排風格、專欄結構、各專欄間的呼應對話統統不見了。社科期刊這一獨立存在的個體已迷失在網絡的海洋之中。

期刊迷失了，期刊人為之傷心，但對作者來說，論文還在，而且以更獨立的姿態存在，傳播的目的以更便捷的方式達到了，他們會滿意。同時，讀者也會歡迎，因為網絡的聚合功能使分佈於各種期刊的讀者感興趣的論文通過簡單的檢索就可以全部呈現在自己面前，遠較檢索和收集紙本期刊方便，且既可以線上閱讀，更可以全文下載，所以讀者很願意為這樣的數據庫而改變自己的閱讀方式。當然，這種閱讀和下載是需要付費的，目前以中國知網為代表的大型期刊數據庫網站都是商業化經營，收費閱讀是其基本的營利模式，不過對於有單位的讀者來說，與在單位圖書館借閱期刊一樣，並不需要自己付費，圖書館一般都會採取減少直至放棄紙本期刊的訂閱，省下經費以包庫的形式購得全部或部分數據庫的線上閱讀和下載許可權。因此，唯有期刊人傷心，他們為期刊所作的種種努力和包裝隨著期刊的迷失大多付諸東流了，而且，讓期刊人傷心的事還在繼續，那就是隨著期刊數據庫的風行，期刊紙本的發行人數直線下降，且無可挽回。

當回顧學術期刊數字化短短十多年的歷程時，我們不能不承認，紙本期刊終將為數字化期刊所取代，而且，這個將來並不遙遠。不僅如此，今天的學術期刊人還必須直面這樣一個事實：隨著數字化的演進，期刊在學術傳播中的中心地位已日趨旁落。如果說，學術論文是學術成果的主要形式，學術成果傳播主要是學術論文的傳播，那麼，在紙本時代，學術傳播的最小單元是學術期刊，論文不經學術期刊發表，根本無法進入廣泛傳播的過程，也就難以得到學界和官方的承認，而且，一篇文章只出現在一本期刊中，否則是不道德的一稿兩投或多投，期刊可以很好地控制優質稿源，其在學術傳播中的中心地位幾乎不可動搖。在進入數字化互聯網時代後，情況發生了改變，互聯網的交互性在理論上使傳播成了個人可以獨立完成的行為，而公益性的學術論文開放獲取（OA）網站、單篇論文優先線上出版等新事物的出現，則在實踐層面使個人的傳播行為得以真正實現，<sup>⑨</sup>傳播的最小單元已由期刊變成了論文，一篇文章一個“數字對象唯一標識符”（doi），可以無限組合和傳播。從理論上來說，針對不同讀者的個性化服務可以建立在無限組合基礎上。在數字化時代，讀者訂閱的單元將不再是期刊，而是個性化的專題論文組合。從信息時代信息聚

合和權力分散的特徵來看，傳統期刊將從學術傳播的中心被驅趕到邊緣並非危言聳聽。

從表面上看，單篇論文的走強、期刊的走弱似乎是中國知網這樣的期刊數據庫網站對學術期刊所採取的壟斷式和掠奪式的建庫及經營模式造成的，這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只是外在的原因，數據庫借助數字化技術實現了更好的傳播才是問題的本質。如同手工作坊無法抗拒機器化大生產一樣，孤立的紙本期刊敵不過具有聚合效應且不受時空限制的數據庫是歷史的必然。不過，像中國知網這樣的大型期刊數據庫雖然初戰告捷，但遠非盡善盡美，它為自己設定的目標也遠未達到。在通往其宏偉目標的前程上，有著諸多僅靠其自身難以克服的障礙。

首先，建庫的理念還局限於圖書館模式，一味貪大求全。一方面，入庫的期刊良莠不齊，大量的學術垃圾充斥其間；另一方面，鮮有個性化組合，無法準確提供讀者最需要的文章。數據庫雖然實現了數字化傳播，但這種傳播是初始的和粗放式的，遠未達到數字傳播的最佳效果和境界。從傳統圖書館模式到真正的數字期刊模式，各大期刊數據庫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其次，與入編期刊間的緊張乃至對立的關係始終難以緩解。期刊數據庫網站幾乎無一例外地都選擇了商業化運營，其壟斷和掠奪式的建庫模式雖然使其初始發展迅速，在短時間內完成了原始積累並得實現規模化經營，但與入編期刊的合作從一開始就沒有建立在互相信任和平等互惠的基礎上，遺留下了諸如入編期刊所獲回報過低、作者授權並獲得相應報酬難以完全實現等事關發展模式和知識產權保護的關鍵性問題。隨著知識產權意識和數字化生存意識的加強，學術期刊不會長期忍受與數據庫網站的不平等關係，也不會放任數字版權的流失。如何重建與入編期刊的關係將是對各大數據庫運營商的嚴峻考驗。

再次，商業化經營的數據庫網站將面臨來自完全公益而非營利的開放獲取網站的挑戰，特別是由國家資助的大型開放獲取網站，這始終是他們的噩夢。近年來，作為對收費閱讀以營利為目的的期刊數據網站的一種對抗，以開放獲取作為建庫模式的學術期刊數據庫正如雨後春筍般地在世界各國出現，不僅在發達國家，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也已漸成一種趨勢。<sup>⑥</sup>面對開放獲取期刊數據庫的挑戰，商業化經營的期刊數據庫將何去何從，這是各大運營商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期刊數據庫只是一個掌握了數字化技術的純粹的產業鏈下游的發行商，難以介入上游知識產品的生產之中，沒有入編期刊的合作，數據庫就會成為無源之水，更沒有能力完成對入庫學術論文進行符合學科發展需要的體系化構建。如何才能留住這些期刊並進行深度合作，各大運營商都得費一番思量。

對於現有的大型期刊數據庫來說，上述諸問題每一個都足以致命，解決這些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與入編期刊真誠而平等的合作。離開了期刊的合作，它只能停留在初始的、粗放的階段，很難再向前推進，更不用說實現像知網自己所設定的宏偉目標了。而且，長此以往，在激烈的市場爭奪中終將難免被淘汰的命運，而為新興的後來者所取代。

因此，對學術期刊來說，亡羊補牢，猶未晚也。學術期刊的生命力並未就此而終結，它只不過是在數字化的最初階段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而已，從現在開始奮起直追，未始不能趕上數字化的進程，因為期刊人手中仍然握有最重要的砝碼——期刊的原始數據。在數字化時代，技術固然重要，但“內容為王”永遠也不會改變。只要牢牢控制住和運用好數據源——優質的學術論文，學術期刊就有了走出困境的資本，仍然可以從數字傳播的邊緣回到中心。當然，信息時代的傳播將是多中心的，期刊作為學術傳播唯一中心的地位也許已一去不復返，但理應成為中心之一。因此，期刊人必須學會數字化生存。

首先，要將編輯工作的重心從紙本轉移到數字化期刊上來。到目前為止，所有學術期刊的工作重心都還在紙本，數字化充其量只是紙本的副產品，期刊在信息時代的種種不適應和被動局面，皆因此而產生。

其次，完成必要的資源聚合。工作重心之所以至今仍難以向數字化轉移，主要原因在於單一期刊的數字化轉型是困難而沒有多大意義的。數字化較紙本的優勢除了傳播的迅捷以外，還在於資源的聚合，沒有足夠量級的數據源，數字化這條高速公路就沒有車跑，或跑的儘是空車，也就沒有意義。因此，期刊數字化的轉型必定是批量的和群體的。

再次，要建立符合數字化要求的期刊體系及與之相對應的協同機制。無論是紙本時代還是數字化時代，學術期刊都應該有自己的體系。在論文代替了期刊成為學術傳播最小單元的數字化時代，期刊特別是綜合性期刊很少能進行整本的傳播，但論文的傳播並非雜亂無章，而必定是有序的，只不過其序列較紙本期刊更為複雜和多變。以學科和問題為中心對來自各種期刊的數據進行有序組合，將是數字化期刊體系的基本形式。這也決定了批量數字化轉型後的期刊群必須進行靈活複雜和不斷演變的多重組合，其調整變化的依據是學術界的最新動態。可見，離開了期刊群體內的協同運作，數字化期刊體系的構建也就無從談起。

最後，在數字化傳播方面，既要與大型數據庫合作，又要掌握充分的自主權和控制權。不論是數字化轉型，還是資源聚合和建構體系，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更好的傳播。但是，進行數字化傳播，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在人才和技術以及設備諸方面均非長項，這樣的欠缺一時難以改變，更主要的是，聚合性的傳播不可能由某一家期刊獨自承擔而應該有專業製作隊伍和機構。因此，可以有兩個選擇：其一，學術期刊聯合起來共建共用一個數據庫並進行開放服務。其二，與現有的大型期刊數據庫合作，利用其技術、設備和已建立的發行傳播網絡，實現順達的數字化傳播。兩種選擇，各有利弊，如同租船、買船還是造船的選擇一樣。第一種選擇一次性投入大，維護成本高，協調管理困難，效率低，見效慢，但期刊擁有絕對的自主權。第二種選擇，無需大的投入和維護管理，現有的數據庫畢竟已培養起了讀者“讀庫”的習慣，擁有了廣闊的市場，在技術方面更專業，也更符合現代社會為了提高工作效率而強調的專業分工理念，當然前提是能建立雙贏的平等合作機制。期刊數據庫要與入編期刊重建合作關係，就需要重新設定遊戲規則，其要義是入編期刊有權參與期刊數據庫的建設，在建庫模式、運行規則的制定方面擁有對等的話語權。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數字化是學術期刊未來發展的方向，紙本期刊被數字化期刊取代是信息時代學術期刊的宿命。目前學術期刊的數字化傳播只是初始和粗放式的，學術期刊的數字化轉型遠未完成，因此，學術期刊應該以積極的姿態迎接這一變革的到來，完成數字化生存的華麗轉身，以數字化的方式獲得“涅槃重生”。

### 三、體制改革與數字化生存的無縫對接

在我們明確了數字化的前景後再來回看期刊體制改革，可以發現：

第一，儘管現實中學術期刊存在的種種問題皆與現行期刊體制有關，改革學術期刊體制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改革僅停留在目前紙本期刊的範圍內，仍然不能為學術期刊贏得未來，因為信息時代已經到來，紙本期刊已成明日黃花，數字化將是未來學術期刊基本的生存狀態。因此，期刊體制改革只有與數字化變革結合起來，且立足於數字期刊體系的構建，才能獲得成功。任何以紙本刊、單個刊為目標的發展規劃都註定是落後於時代的，任何以紙本刊、單個刊



為目標的改革措施也註定是沒有前瞻性的，我們必須在紙本刊、單個刊之外，在期刊集群數字化轉型上尋找突破口。

第二，數字化期刊體系的構建更需要對現行期刊體制進行全面改革。如果說現行期刊體制大大制約了紙本期刊的發展，那麼，對於全新的數字化期刊體系來說，其構建的過程將受到現行期刊體制更大的束縛。甚至可以說，不破除現行期刊體制，數字化學術期刊體系連基本的生存空間都不存在。總署至今未頒發數字期刊刊號，無刊號的學術期刊在現實中就是“非期刊”，其刊發的學術論文連正式發表都算不上（官方和民間都不承認）。為實現數字化生存而進行的任何一個動作，無論是工作中心的轉移、必要的資源聚合，還是協同進行體系的構建和傳播，都會觸碰以單位制為中心的現行期刊體制，期刊數字化生存最大的障礙恰恰來自於現行的期刊體制，因此，必須從數字化期刊體系的構建和發展的角度重新設計期刊體制改革的路線圖。

第三，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對於學術期刊體制改革而言，其意義需要具體分析。所謂市場化，指的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競爭的優勝劣汰為手段，實現資源充分合理配置，效率最大化目標的機制”<sup>⑥</sup>。在市場機制中，商品從市場獲得的回報率是衡量其生命力的唯一標準，也由此決定著商品的生死存亡。學術期刊顯然具有商品屬性，但又不等同於一般的商品，最大的不同在於，其使命事關國家利益，故其創辦者從來不以營利為目的，僅從其通過市場銷售而回籠的資金來看，投入和產出根本不成比例，談不上有回報，虧損是必然的。顯然，純粹的市場化標準在這裡是行不通的，學術期刊有著實現自身價值的特殊渠道和標準，那就是它的社會效益，即能否通過對學術成果的傳播滿足學術研究的需求，這是與市場效率相關但又不盡相同的概念。儘管中央“兩辦”的《改革意見》和新聞出版總署的《實施辦法》都強調了體制改革的市場化方向，但因為學術期刊的存在離不開國家財政的巨大投入，較一般商品，價格杠杆對學術期刊的作用極為有限，這就決定了政府對“轉企”後的學術期刊仍然不可能以價格杠杆代替管制，仍然會以社會效益作為主要評判標準。如果這就是學術期刊的市場化，那它就是一種特殊意義上的市場化，它的市場導向也只能是學術研究的需求，市場調節只能通過學術界對學術期刊的評價來實現，而不是贏利與否。換言之，所謂“優”和“劣”的評判標準不是賺多賺少而是能否滿足學術研究的需求。因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以“轉企”為體制改革唯一手段和目標所體現出的一般意義上的市場化導向，與學術期刊的特殊屬性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矛盾和張力，本文第一部分分析的“轉企”的有限效果其實在現行體制下通過行政命令同樣可以達到，而根本性的問題——符合學術研究需求的期刊體系的構建以提高期刊之社會效益——單純的編輯部“轉企”基本無能為力。

第四，體制改革並未因此而一定走入死胡同，如果在期刊體制改革的同時，引入學術期刊的數字化轉型，將這兩場都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革結合在一起，局面立刻就會不同。紙本學術期刊體制改革要轉變的只是編輯部的性質和編輯的身份，並期望通過“轉企”這一改變帶來學術期刊格局的根本性變化，但這樣的期望多半會落空，因為學術期刊不能與學術研究的母體相分離，一切導致學者與期刊疏離的所謂市場化措施都將致使改革失敗。而引入數字化變革之後，變革所要求的工作中心的轉移、資源的聚合、協同進行的體系構建和傳播等等，都會直接導致學術期刊格局的根本性變化，並要求學術期刊體制要有相應的變革，即如前所述，數字化可以成為撬動盤根錯節的現行期刊體制的杠杆。新聞出版總署的《實施辦法》雖然提及了數字化，但只是作為“轉企”後紙本期刊的發展方向之一，基本未脫離數字化只是紙本副產品的定位，嚴重低估了數字化變革的意義，沒有將數字化變革作為期刊體制改革的契機，也就沒有從數字化變革的角度來設計

學術期刊體制改革。

第五，市場化對於學術期刊體制改革仍然具有意義。如果將市場化的標準即直接的經濟回報率替換為社會效益標準即學術界的滿意程度，這個特殊意義的市場化就很有意義。在這個前提下，市場化的一些基本規則是必須通過體制改革引入學術期刊的辦刊機制之中，比如合理的資源配置，效率更高的集約化、規模化發展、健全的專門針對學術研究需求的期刊准入和退出機制、競爭機制等等，可以借鑒市場化標準來考察學術期刊的科學體系構建是否完善，也可以來衡量通過改革重建的體制是否成功。市場化的另一重意義是，無論是與大型期刊數據庫合作還是自己建庫，學術期刊都必須與市場打交道，參與制定規則，嚴格遵守規則，充分利用規則等等，都是市場經濟大環境下學術期刊面向市場時必須學會的。

基於以上分析，不難看出學術期刊體制改革與數字化變革相結合的必要性以及學術期刊市場化的特殊性，那麼，其實現的可能性如何？亦即這兩場在同一時空下的不同變革應該如何設計和進行？早在三年前，筆者就提出了學術期刊數字化轉型的方案<sup>⑥</sup>，當時只是個紙上談兵的方案，如今，它已付諸實踐，這就是創辦於2011年的數字化“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

“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兩年來的發展也許能為我們提供某些有益的啟示。這是最初由17家綜合性大學學報聯合創辦的數字化期刊群，共有《文學學報》、《哲學學報》、《歷史學報》、《政治學報》、《經濟學報》、《法學學報》等共10種一級學科專業學報。由參與聯合各刊共同供稿、協同編輯，由中國知網以開放獲取方式進行線上傳播和自由下載。<sup>⑦</sup>創刊以來，該系列期刊陣容不斷擴大，至2013年初，已由最初的17家擴充至70家，部分高校主辦的優秀專業期刊也加入了聯盟，並著手籌建與之並列的數字化“中國高校系列專題期刊”。

不同於以往任何一種學術期刊的“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不僅實現了純數字化的線上傳播，而且對傳統的期刊體制提出了挑戰，創建了一種全新的期刊編輯、製作、出版、傳播機制。首先，通過將紙本期刊與數字化期刊分開對待的方法，實現了學術期刊的專業化、數字化轉型和集約化、規模化發展。這個轉型的意義在於，它不是某一種綜合性學報的個體轉型，而是數十家綜合性學報的集體轉型；它將專業化轉型與數字化轉型和規模化發展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充分地體現了數字化時代“聚合”的優勢。其次，通過建立聯合辦刊機制，有效地打破了校域界限，成功地破解了高校間的門戶壁壘，“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是高校的，但不再單獨屬於某一高校，而是各校共建共有，成功地恢復了高校學術期刊作為學術界開放的公共交流平臺的基本屬性。再次，通過設立聯合編輯部、主編聯席會議、“網刊之家”QQ群等全新的機構和運用各種信息交流手段，實現了分散在各高校的編輯聯合辦刊，有效地將各校科研力量和成果整合起來，成功地將各校各學科的編輯人員納入到專業期刊的編輯群體之中，從而有望解決期刊體制改革中最大的難題——如何將現行體制中的人納入到改革後的新體制中去。最後，通過將編輯與出版發行分開的方法，達成與大型數字化出版企業的合作，直面學術期刊市場，使雙方在學術編輯與數字傳播中各展其長。

如果從變革的角度來評價這個全新的辦刊機制，可以看到它的兩個重要特點：其一，它對現行的期刊體制提出了全面的挑戰，不僅在於它不同於現行的體制，更在於它能有效地解決現行體制帶給學術期刊的諸多問題；其二，數字化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通過對數字化種種優勢的發揮，實現了專業化轉型和集約化、規模化發展。因此，儘管不符合現行的期刊體制和傳統期刊模式，但它的出現，不僅是學術界所期盼的，而且恰恰是與報刊體制改革決策者預定的改革

目標完全吻合的。<sup>⑧</sup>這個嘗試提示我們，期刊體制改革如果能與最新技術相結合，將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體制改革與數字化變革可以而且應該完全交融在一起，互相依賴，共同完成。

“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的創辦從實踐層面對體制改革如何與數字化相結合探索了一條可行路徑，這就是將紙本期刊與數字化期刊分開、編輯與出版分開的“兩分開”改革路徑。將紙本期刊與數字化期刊分開，改革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數字化期刊體系的建立上。真正的數字化學術期刊體系及其體制目前基本上還是“一張白紙”，很少羈絆，可以從容構建。學術期刊的編輯活動本質上屬於學術活動，並不是非“轉企”不可，將期刊編輯與出版發行分開，編輯繼續留在高校和科研單位中，這既符合學術期刊的傳統，也是當今各國學術期刊的慣例，對辦好學術期刊來說，更是必不可少的條件，而出版發行則可交給大型出版集團或數字化網站，在明確雙方責、權、利的基礎上，可以使學術期刊更好地走向並適應學術市場，實現編輯者與出版者的雙贏，也可讓學術市場來選擇期刊，沒有出版和發行價值的期刊將會自然退出。<sup>⑨</sup>實踐證明，“兩分開”的改革路徑既可以實現學術期刊的數字化生存，也可以達到體制改革所要達到的真正目的。

“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是學術期刊人試圖突破體制的束縛而創辦的，它必然存在與現有體制不相符合之處，它之所以能夠在現有體制下成立並運行，是因為得益於體制改革和數字化變革的大背景，主管部門鼓勵創新，包括體制和機制創新，但這樣一種新型的辦刊模式是否能得到最終認可，亦即是否能得到改革後新體制的保護，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而在新體制認可它之前，它的存在和運行都處在非常艱難的狀態下，除了沒有先例可循，缺乏體制的保護使其身份不明和缺乏必要的經費支持是阻礙其繼續發展的最大問題。由此觀之，儘管學術期刊體制改革是可以而且必須與數字化變革實現無縫對接的，但最終能否導致學術期刊體制與體系的科學重建，還取決於決策者的頂層設計與業界的底層設計能否完美地結合起來。

出自中央政府關於期刊體制改革的方案顯然屬於頂層設計。學術期刊的改革需要有頂層設計。頂層設計事關改革的方向、目標以及路徑，如今，作為頂層設計層面的改革大方向和目標已經明確，但具體實施仍困難重重，問題出在路徑設計上，特別是《實施辦法》遭到了業界的普遍抵制，可見，僅有頂層設計是不夠的。

相對於頂層設計，來自業界的底層設計對改革的成敗同樣重要。“制度設計是個精細活，既要有頂層設計，統籌全局、高屋建瓴，又要有底層設計，抽絲剝繭、腳踏實地，既要關注歷史大勢，也不可忽略政治或者經濟發展中那些看起來沒有分析價值的小事。”<sup>⑩</sup>頂層設計往往著眼於核心制度的變革，通過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革而實現設計者心目中的合理改革目標，因此，與明確的目標相比，達到目標的路徑設計卻不免粗疏。面對現實情況的複雜多變和利益的錯綜糾葛，一刀切地“轉企”這樣的路徑設計很難做到確保改革平滑順利地進行。在這樣的時候，底層設計的重要和必要就充分地體現出來了。

“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的設計可謂標準的底層設計。儘管它與中央的頂層設計和新技術革命帶來的巨大挑戰有直接關係，但對學術期刊現狀的不滿和尋求新出路的衝動，是提出這一設計的根本原因。它不是緣於空想，而是從現實出發的來自業界的“為爭取獲利機會自發倡導和組織實施的對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是一種自發性的制度變遷”<sup>⑪</sup>，雖然體現為基層自發的行為，但其歸宿還是指向制度的頂層設計，它在改革的方向和目標上，與中央和總署的頂層設計是完全吻合的。

筆者有理由認為，學術期刊體制改革與數字化轉型這兩場都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革能否無縫

地對接在一起，決策者的頂層設計與業界的底層設計能否完美地結合起來，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體制改革和數字化轉型能否獲得成功，集約化、規模化發展能否實現。

①劉澤生：《總編視角·主持人語》，澳門：《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②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深化非時政類報刊出版單位體制改革的意見》，中辦發[2011]19號。

③新聞出版總署：《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2012年7月30日，新聞出版總署網站，<http://www.gapp.gov.cn/cms/html/21/508/201208/761738.html>。

④朱劍：《學術風氣、學術評價與學術期刊》，江蘇蘇州：《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

⑤羅驥對報刊編輯體制改革後學術期刊可能出現的變化有頗為詳盡的分析，見羅驥：《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背景下學術期刊生存方式的轉變》，澳門：《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⑥“信息化時代”，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845511.htm>。

⑦尼葛洛龐帝：《數字化生存》，胡泳譯，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

⑧朱劍：《電腦的介入與社科期刊的發展》，南京：《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5期。

⑨“中國知網”，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775616.htm>。

⑩參見徐楓、郭沁：《傳統學術期刊的數字化轉型：做最好的線上傳播》，澳門：《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⑪參見陳晉：《開放獲取十年：2001-2011》，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

⑫“市場化”，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086768.htm>。

⑬朱劍：《高校學報的專業化轉型與集約化、數字化發展》，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

⑭關於“中國高校系列專業期刊”從最初的設想到創辦的情況，可參見朱劍：《高校學報的專業化轉型與集約化、數字化發展》；仲偉民：《中國高校學報的歷史、現狀和將來》，澳門：《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崔月琴：《學術期刊國際化的反思及路徑探析》，澳門：《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趙東奎：《學術期刊的技術轉型與制度轉型》，澳門：《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⑮在新聞出版總署《關於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的實施辦法》中，除了“轉企改制”外，還提出了：“報刊編輯部體制改革必須……與調整報刊業結構、轉變報刊業發展方式相結合，與實現報刊業集約化經營、培育大型報刊傳媒集團相結合，與推動傳統報刊業向數字化、網絡化現代傳媒業轉型相結合，與建立健全報刊准入和退出機制、科學配置報刊資源相結合。”簡單地說，就是通過報刊體制改革，要實現專業化、集約化、集團化、數字化。

⑯朱劍：《傳統與變革：體制改革前夜學術期刊的艱難抉擇》，澳門：《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1期。

⑰⑱葉娟麗：《中國大學學報：制度變遷與路徑選擇》，南京：《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

**作者簡介：**朱劍，《南京大學學報》執行主編、編審。南京 210093

**[ 責任編輯 劉澤生 ]**